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 英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 古籍保护

专刊

藏書報  
2021年4月19日  
总第109期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业支持

## 收入 24066 种图书 共享普查成果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已出版 5 卷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近日，记者从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获悉，民国时期文献普查阶段性成果《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宗教》正式出版。该书收录 1911—1949 年 9 月出版的宗教

类中文图书 7176 种，与之前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相比，收录图书种类增加 55%。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是一部反映民国时期文献最新普查工作成果的大型回溯性书目，主要收录从 1911 年到 1949 年 9 月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酌情收录这段时间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该书目按学科分为 18 卷，分卷陆续出版。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于 2015 年 2 月启动《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撰工作，目前已出版 5 卷。第一卷《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哲学》于 2018 年 5 月出版，主要收录 1911—1949 年 9 月国内出版的有关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中文图书 4830 种；《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社会科学总论》于 2019 年 12

月出版，主要收录 1911—1949 年 9 月国内出版的有关社会科学总论方面中文图书 2964 种；《民国时期图书总目·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于 2020 年 6 月出版，主要收录 1911—1949 年 9 月国内出版的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方面中文图书 5079 种；《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农业科学》于 2020 年 11 月出版，主要收录 1911—1949 年 9 月国内出版的有关农业科学方面的中文图书 4017 种。已完成出版的 5 卷书目合计收录图书 24066 种，对比《民国时期总书目》相关类别收录总量 17914 种，增长了 34%，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图书的出版状况，并为研究当时的相关领域发展情况提供参考和帮助。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是在参与

民国时期文献普查的各个机构的大力支持下，依托“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并吸收了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各省级成员馆、“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CADAL）的主要高校成员馆以及一些专业图书馆等民国时期文献主要收藏机构的书目数据基础上编纂而成，参编单位 51 家。书目的完整性、藏书机构的代表性等各方面都较《民国时期总书目》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外，该书目的一大特色是待陆续出版完成后将实现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线上数据联动，以满足数字时代大背景下读者对于民国时期文献数据的实时便捷查找、识别、选择和获取，共享普查成果，助力相关学术研究。

## 糰糊

□侯妍妍 山东省图书馆

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里有这么一段：三毛去街上贴标语，因为肚子太饿就把刷标语用的糰糊吃掉了，结果挨了打。读这本漫画的时候年纪尚小，不知道糰糊是面粉冲的，只觉得三毛可怜，饿到什么东西都吃的地步。

后来慢慢知道了糰糊是面粉做的，但真正第一次上手制糰糊还是在参加云南第八期修复初级班的时候。那一期培训班大多数都是云南省内的学员，其他各省学员加起来只有八九个。当杨利群老师把一盆面粉放在桌上问谁会揉面的时候，所有学员的眼睛齐刷刷看向我，因为我是山东的。在南方同学的印象里，山东人喜吃面食，理所应当的会揉面。

而我偏偏是个不会揉面的山东人。我问：揉面干嘛呢？杨老师说：洗面筋。

洗面筋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课程。面粉揉成团，用纱布包住在水中反复揉洗，洗出的粉汁再细细过滤后静置沉淀，期间要换几次清水，最后沉淀出的粉水晾到干透就是修复古籍用的糰糊原料。

面粉去筋后剩的淀粉就可以用来打糰糊了。糰糊可以冲可以熬。熬的时候先用水把粉稀释，在电磁炉上调至低温顺时针搅，直到糰糊的颜色变微微发灰白且半透明就可

以了。冲糰糊比较快，但是初学时不如熬糰糊好控制。我刚刚开始冲糰糊的时候心里特别紧张，不是冲不熟就是水多了，慢慢地才掌握了一些技巧：若是冬天室内温度低的时候，开始调粉的水用微温的会好一些，水烧开了，先一点点滴进去，然后再快速冲，冲浆时两手要配合好，一手冲沸水，另一只手要不停顺一个方向搅拌，否则不易冲匀会有生粉疙瘩。这些都是靠经验得来的。修复这个活儿就是在干中总结，不做的话那些精髓的东西永远都体会不到。

实践出真知，实践的过程也是答疑解惑的过程。在南京学习冲糰糊时，一切方法、比例、温度等要素全都正确，冲出来后的颜色却是厚厚的灰色。如果是地瓜淀粉或者玉米淀粉冲出来颜色发黑或黄很正常，但包装袋上明明是小麦淀粉，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指导老师刘建明说大概是水温太高，熟过了。果然，冲好的糰糊放置了半小时后又变成了正常的颜色。那是我冲糰糊遇到的一次印象最深的意外，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现在的修复工作是越来越科学化，调制糰糊的配比、糊化温度、生熟程度都可以用数据来计量和表示，对古籍修复工作来说是一种进步。不过我个人觉得那些修复工作者应该有的职业敏

感是不该丢掉的，这些敏感都来自经验，来自不断实践的积累。科学设备说到底只是辅助，不能取代修复者的技艺和技能。

为了保证糰糊完全糊化，冲熬糰糊要搅拌 20 分钟左右，再静置至室温，用清水养起来，去了新糰糊的燥性就可以用了。是的，糰糊也是有脾气的。搅糰糊的时候顺着个方向均匀搅拌就可以，我常趁这个时候边搅边看书或听音乐，这时候就充分理解碎片时间这个词，也会因享受这些碎片时间而享受着修复工作本身。修复工作中这样的碎片时间很多，修复工作急不得，对于修复而言，快不一定代表着效率，慢也不一定意味着拖延。

修复时用的薄浆水是很稀的。稀到什么程度？我师父的经验是用毛笔搅一搅然后提起笔来，毛笔上的浆水形成一条细细的线流就可以。明代周嘉胄说“良工用糊如用水，止在多刷”，即糰糊用多了不但是虫患的源头之一，还会使纸张发硬，降低了可逆性，不利于二次修复，所以历来有良工用稀浆之说。周嘉胄紧接着还有一句“刷多则水沁透纸，凝结如抄成者，不全恃糊力矣”，原来周嘉胄已经懂得适量的水分子会使纸纤维之间连接更加紧密从而使纸张恢复一点柔韧性的道理，要不《装潢志》怎么成了书画修复“江湖”中的“武林秘笈”了呢。不过活学还是要活用，周嘉胄的时代毕竟还是远去了，那时的环境、材质都变成了现在无法复制的因素之一。而当代也自有当代的进步，所以读秘笈和练秘笈有时是两码事。

## 云南省图面向社会开展传拓研习培训



本报讯 4 月 12 日，“云南省第一期古籍、文物保护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培训班”开班，来自图书馆、文物保护部门、博物馆、高校、各类艺术馆的相关工作者及社会相关爱好者 27 人参加培训。

云南省图书馆于 2020 年建立“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保护传拓研习馆”，“研习馆”以传承文明，古艺今扬，寓教于乐，技艺研讨，普及推广为宗旨，探索传统文化保护服务与社会教育的新方式，动员社会机构、个人广泛参与古籍保护。“研习馆”开展以古籍修复、古籍保护、碑刻传拓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文化社会化实践研习活动，致力于传统文化及非遗技艺的保护、传承与科普（推广）。

本次培训班为期 5 天，内容包括文物保护传拓理论、传拓技法和拓片装裱技法，旨在通过对传拓的研修、培训，摒弃旧有的落后技法，树立文物保护传拓观念，在传拓实践中把先进的古籍保护理念作为传拓指导原则，使拓片这种金石文献资料能够收藏的更加久远。（张维祥）

# “开化纸”：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汪小帆 浙江图书馆

这几年，论起全国手工纸关注度，若是“开化纸”排第二，大概也没谁敢认第一了。

2017 年 3 月，“开化纸研究实验室·杨玉良院士工作站”在开化纸技艺研究中心正式启用。同年 11 月 24 日，第一届古籍写印材料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开化县召开，与会的世界各地代表，就开化纸的历史源流、制作工艺、分析检测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间，35 部开化纸本古籍在现场展示，这是首次集中展现开化纸本文献，规模之大，品种之多，使参会人员赞叹不已。与此同时，对于开化纸究竟以什么为原材料，历史上的产地到底是不是开化县等问题的探讨，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18 年，国家图书馆的易晓辉先生在《文献》上发表论文《清代内府刻书用“开化纸”来源探究》，援引王传龙博士的《开化纸“考辨”》以及翁连溪老师的《清代内府刻书研究》的结论，进一步从史料、档案以及科学检测手段等方面，提出清代“开化纸”实为“泾县连四”，其原料为青檀皮等观点。针对开化纸古籍文献在社会与业界引起的高度关注，2019 年 11 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开化纸古籍专题研讨会”，再次邀请专家进行研讨，提供了一个专题讨论的平台。

关涉开化纸的每一次会议、争论，总有一个入会被推到风口浪尖，此人，就是开化纸工作坊的负责人黄宏健。我第一次见到黄老师，就是在 2017 年开化的那次会议上，他驱车带我们前去参观工坊。也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他并非一直都是个做纸的匠人，最初，他的谋生手段是开饭店，只因为喜欢舞文弄墨，才对“开化纸”上了心。说真的，刚知道这一点，心里确实有点不以为然：半路出家，能做出好纸？随后，“开化纸”一次次被证实极有可能并非为开化县所产，而黄宏健所提出的在开化县复原“开化纸”的话，就总显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 2019 年第二届传统写印材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黄宏健做了关于传统手工纸与现代生产的发言，提出立志做中国最好的手工纸时，被与会的一位藏书家当面质疑：“到底有没有把‘开化纸’复原出来？”场面颇为尴尬。不过，黄宏健倒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倒是常有消息在业内爆出：经过 300 多天的疲劳测试，最新研发出来开化纸，寿命可达 2825 年；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合作，开展纸浆生物漂白技术研究；世界级印钞邮票雕刻大师马丁·莫克使用黄宏健制作的“开化纸”，印制了作品《一带一路“帆船”》，并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英国伦敦皇家集邮协会 150 周年国际庆典上展出。我想，不管做出来的是不是曾经的“开化纸”，只要他能够坚持开发研究手工纸，对我们修复师来说，总归是件大好事。

2020 年 10 月中旬，有机会去开化的根官佛国文化旅游区参观。这个地方

我早几年曾去过，所以预先联系了黄宏健老师，索性脱离一同前往的大部队，由他开车到旅游区接我，去他家访纸。

我和黄老师性格都比较直爽，上了车，并无过多寒暄，直接切入正题。他告诉我，他们家目前使用的皮料因生态保护的原因，在没有人工种植的前提下暂时由国外进口的替代：楮皮，是泰国产的；雁皮，菲律宾的。他认为，国内的原料，生产周期不统一，在制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进而影响纸张质量。而菲律宾的皮料，是统一人工培育的。“原材料很重要，设备也很重要，所以我这里已经开发研制了一套半自动的制浆设备。因为手工纸定量生产，全靠人工不行，产能低，工人技术不稳定，品控如何把关？我们一方面与复旦合作，一方面跟上海质量技术研究院和浙江质量技术研究院联系，由他们帮我们做检测，一边检测一边调整。”我不禁问道：“这样，岂不是变成半机器纸了吗？”“这在日本叫做机制手工纸。”黄老师很认真地纠正我，“机器制作但有着手工纸的品质，您想，未来做手工纸的人越来越少，而且每个人做出的纸都不一样，手工纸的发展如何顺应时代的需求？我们做出的手工纸，用上海德堡印刷机，可以一分钟印一千多张，但稍微有点厚薄不均匀，就卡上了。难道，还要让我们去用上世纪 40 年代的那种老式印刷机吗？全部使用雕版印刷也不现实吧。所以说，打造科技的平台再融合传统的工艺，创新的理念很重要。对，创新，没有创新的理念就没有办法持续发展。我们有信心能研制出半自动的抄纸设备，造出高品质的手工纸。”不断的新名词从黄老师口中跳出，我恍然觉得，自己是在与身在科技前沿的技术人员交流。他对日本纸张也分外关注，这种关注并不仅仅停留在纸张本身，他甚至会对日本人的书写、刻印特点来分析中国和日本纸张的特点，这些考虑都是非常深入和实际的，听完有点意外。

车很快到了工坊，小院子与三年前没有太多变化，依然小巧精致，花坛里倒是多了不少植物，上面还挂着木质小标牌，名称一目了然：“杨桃藤”“构树”“青檀”，还有“茼蒿”。原来它们都是造纸的原材料或者辅料。黄老师托着茼蒿的枝条，叹惜道：“我们之前准备自己培植茼蒿，弄了几十亩的地，就是想从源头确保品质，可种下去 2000 多株，现在只剩下 300 株活着。”

院子的小平房后面，新盖起了一排二层小楼，楼前回廊的空地上堆放着茼蒿皮料的半成品，想来，这就是从国外进口的吧。一楼是一个大通间的车间式工作场地，大部分是机械化的制纸机器，不知道是不是黄老师所说自己研发的半自动机器，但我的吸引力早被坐在屋内的两位师傅吸引过去了，只见他们手里各拿一把镊子，在一盆清水样的稀浆料里挑捡杂质。这可是又费眼又费时的活儿，但黄老师却并不以为然：“上回打浆机没有清洗干净，浆料混进了一点杂质，捡掉就行，否则会影响纸面清洁度。”工场深处，有一个小房间，是黄老师从江西鹅湖纸坊请来的何姓抄纸老师傅的工作间。人是从江西请来的，可这抄纸的方式却非江西的，而是黄老师自己研究实验出来的。水槽边上，也放着把精细的小镊子，何师傅偶尔拿起



小镊子去检出纸面的杂质。看来，他们这里做纸，要求真的是很高。可按照这样的方式，如何能出量呢？黄老师告诉我：“何师傅光纸（纸张上焙墙）做得比我好，他做了一辈子了，但抄纸不如我。你别不信，我抄纸很不错，但太忙了，每天只能抄个一百多张，有时候甚至只有几十张。数量先不去管它了，关键是先考虑要做出好纸。而且，我不是研发了设备吗？将来抄纸也可以用机器替代，这样，品质才能有保障。”他边说边往外走，而我却被堆放着干浆料的四个箩筐吸引住了。因为，有意思的是，这四筐浆料颜色深浅不一，或者说，颜色由深至白。经黄老师一指点才明白，他们是采用生物酶技术进行漂白工艺的，黄老师的说法很通俗形象：“用生物酶把木质素吃掉。”其实生物酶技术在纸浆漂白中的应用时间并不短，它的作用原理就是通过酶与浆料中化学成分的反应，提高浆料的可漂性，并直接降解木质素，以提高浆料白度。生物酶漂白纸浆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技术，可有效降低纸张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在传统手工纸制作中使用，至少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生物酶漂白纸浆，有利有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活性细菌，可以通过加温加压等方式，使它发展成为一个群体，把木质素，就是那些黑色的物质吃掉，但它们发展太快，如果不及时提供新的原材料，它们就吃浆料，这是一个弊端。我们现在研究如何来控制活性细菌的发展速度，以及降解木质素的程度，人工控制一下，达到我们自己的标准。”听着黄老师这样介绍，突然回想起 2019 年 11 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传统写印材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谢守斌博士曾经做过题为《开化纸纸浆生物漂白的初步研究》的报告。看来，眼前这些浆料，正是他们

研究、实验并且付诸生产的成果。

按照我访纸的惯例，总是会问问做纸人对纸帘的看法。黄老师认为，现在的纸帘密度不够，不光是竹丝的问题，还与绑竹丝的那根线有极大的关系。从帘子侧面看，现在的绑线都是圆柱形，每个打结的部位都突出于帘子平面上，绑结明显，帘纹就明显。过去的制帘师傅会抽生丝绑帘子，那样的丝绑出的帘子，打出的结都是扁的。“不是说‘开化纸’帘纹细密，目测不明显吗？我想，跟这个丝线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就可以利用纳米技术制作丝线，不过他们要求的制帘量很大，我们这一点帘子的需求量太不足道了。”事后，我查看了资料，从一些实践数据可以得知，各种规格的生丝，其横截面近似于椭圆形的，大体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不知道这个椭圆形的形态是否对制作纸帘有利？如果黄老师能够与相关部门开发研制出合适的丝线用来编织纸帘，也是有利于手工造纸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我们回到他的工作室，观看作坊内制作的各色纸样，看得出，黄老师很得意自己的作品，每拿出一张纸，就非要我猜是什么原材料的。我的眼睛毕竟不是显微镜，何况，他的制作工艺使得有些纤维特征并不明显。我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猜测，差不多屡猜屡错，狼狈不堪，他就笑得格外开心。确实，纸面洁净细腻，甚至有点晶莹的光泽，经过搓揉试验后，这些皮纸不破不烂，甚至更加柔软如同丝绸一般，我倒也是心生欢喜。他这里也用机械设备制作出一些每平方米三克重的超薄皮纸，他也取出让我瞅瞅，问我这些纸可以派上什么用场。我试了一下纸张强度，觉得倒是可以用做古籍修复中的溜口。他挺高兴，因为他目前对自己手工纸的定位，就是纸质文物修复和高端印刷材料。

我们避无可避地又谈到了“开化纸”的“祖籍”问题。黄老师一脸坦然：“开化纸的祖籍地是不是开化，现在造的纸是否达到明代或清代的开化纸水平我们就交由专家考证评论，关键是要拿得出好纸，只有做出好纸才能说明问题。我们不急，不会现在就产业化。我一定要做最好的手工纸，要把它们送去 SGS 检测（SGS 是瑞士通用公证行的简称，是全球领先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是公认的质量和诚信的基准，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资格最老的民间第三方从事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鉴定的跨国公司），我希望未来，在国外修复中国古籍的人，不再使用日本手工纸，而是用上我们自己做的纸。我也希望，我们做的纸，能在国内手工纸领域内引起震动，推动大家一起制作好纸！”

下午，黄老师带我去参观他的茼蒿培育基地。茼蒿树苗与其他植物混种，相比旁边或茁壮成长或郁郁葱葱的植物，夹杂在其间的茼蒿苗显得有点纤细而孱弱。他连续从地上拔出数根枯死的茼蒿，再一次跟我说：“汪老师，我们之前种下去二千多株，上次来看就只剩下二百多株了，今天，看来剩下的就更少了，再继续努力吧。”

做出一张好纸，很难；做出一张让业内认可的好纸，更难；做出一张让国际上认可的好纸，难上加难！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 从小耳濡目染 不断实现飞跃

## 何谋忠：以匠心和创新复活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刘晓立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作为占据古丝绸之路近四分之一长度的文化大省，甘肃省也由此掀开了古籍保护修复的新篇章。先是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挂牌，接着又获批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并取得了甘肃省文物局认可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完成馆藏具有重要地方文化意义的清末民初手抄戏曲剧本的修复项目。作为出生于字画装裱世家、师承师有宽先生、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助理导师、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科科长何谋忠，对古籍修复有着独特的感悟和深入思考。

### 三段学习：奠定深厚的基础

“我出生在一个字画装裱世家，新中国成立以前爷爷就在城里开了一家裱糊铺，爸爸承袭家业，我也从小耳濡目染，对字画装裱有了一些了解，时不时还会给他们打打下手。”何谋忠称那段时间对字画装裱就是感觉好奇、好玩，真正开始大量实践是在1980年高中毕业以后，当时兰州军区要为一一些平反老干部所书写字画作品做装裱，“因为爷爷年纪大了，又一直在甘草店书库做《四库全书》的看护员，所以就是爸爸带着我，和一位甘肃省博物馆的老师一起完成的”，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何谋忠对字画装裱技艺已经能够非常熟练的掌握。

参加工作以后，何谋忠先是在甘肃省图书馆从事古籍阅览服务相关工作，后又到缩微中心，开展古籍缩微拍摄等工作，可以说一直在与古籍“打交道”，一方面对古籍有了较深的了解，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古籍保护的正確理念与常识。“2011年甘肃省图书馆成立古籍修复中心，我又回到了‘裱糊匠’的岗位上，跟着师有宽先生学习古籍修复。”何谋忠回忆说，在师先生系统地、手把手地教学下，自己在字画装裱之外，对古籍修复技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尤其是2014年我馆被授予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成立了甘肃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传习所之后，我馆连续举办了5期国家级的培训班，两期省级培训班，并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首次申报了甘肃省非遗项目，并在甘肃一些地、县设了8家修复技艺传习点，形成了甘肃全省良好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环境与氛围，而何谋忠作为传习所助理导师，在这期间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与技艺的提升。

从家学，到师承师有宽先生，何谋忠掌握了字画装裱与古籍修复两门过硬的技艺，而到国家图书馆参与“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又让他的古籍修复技艺得到一种飞跃。为了培养人才，形成交流，“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曾在一定时期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古籍修复骨干，他们不仅彼此之间能互相学习，还能更深入地了解国家图书馆的一些

管理理念、修复方式。“比如量化管理和档案管理等，国图和我们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量化管理是因人而异、因书而异的，在制定任务目标的时候，修复数量和难度必须得到每个人的认可，以保证最后目标的保质保量完成；而国图更强调年度修复数量的量化。”何谋忠表示，在档案管理方面，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更加标准化，在学习之后，甘肃省图书馆也很快做出了改进。

“在国家图书馆学习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修复《名臣奏议》这本书，其主要问题是絮化，为了一叶叶揭开，我投入了很大的耐心和精力，在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它修复完成后，那种成就感也是加倍的，因为参加了国家级修复项目，能够亲手触摸到‘国宝’，所以格外珍惜，收获也格外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收获，何谋忠为从事古籍修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 项目实践：抢救修复清末民初地方剧本

“进入修复中心以后，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修复项目，就是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戏剧剧本的修复保护与整理。”何谋忠介绍说，甘肃省地处中国西北地区，地方戏曲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古至今积累了大量的戏曲剧本。1956年甘肃省流行剧目编审委员会和甘肃省戏剧委员会等单位，在举办“全省老艺人示范演出”活动期间，开展了“发掘戏剧遗产竞赛”的活动。活动中，经由老艺人捐献，专业人员收集、收购获得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秦腔、陇南影子腔、陇东道情、曲子等传统剧本，其中不乏甘肃特有剧目和已经在舞台失传的剧目，还有格外珍贵的剧本，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火烧新野》。这批戏剧手抄本几经辗转入藏甘肃省图书馆后，古籍专家对其进行了全面清点、编目、造册。随着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工作的起步，这批珍贵老剧本被列为首批需紧急抢救的项目之一。

“剧本不同于其他古籍，从当时面世到流传至今，许多散落在民间，始终未能得到保护，加之剧本所用纸张基本是手工生产的价廉质劣的麻纸、粉连纸、毛边纸和本地‘土纸’，规格不一，

而且书页纸张有酸化、絮化、霉变、虫蛀、烟熏、脆裂等严重的破损现象，修复难度非常大。”作为修复科科长，何谋忠与同事边实验边探索，从清洗油污，到解决粘连问题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方法。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也为后面解决一些修复中遇到的特殊问题提供了参考。

“在这些剧本中，有不少油污很重，猜想可能是因为当时用煤油灯，不小心打翻后污染到书中。”何谋忠介绍说。油污重不仅影响剧本美观和阅览服务，而且影响修复中粘合剂（糨糊或其他）的粘性，只能先进行去油去污。“清洗的时候，我们很慎重，因为清水洗不掉油污，用化学药剂又会对纸张和字迹产生损伤，我们后来考虑是不是可以用食品级的生物洗涤剂，并慢慢尝试做实验，最后感觉效果还不错。”

还有一种让何谋忠感觉比较难处理的情况就是粘连。“有些书因为霉变粘连比较厉害，有的已经完全成为‘书砖’，干揭揭不下来，我们就会考虑用开水烫一下，还揭不下来，就会上笼屉利用蒸汽蒸，等纸张纤维软化以后再慢慢把它揭下来。”何谋忠介绍说，在这批剧本的修复中，用到了多种揭的方法。

从取书、制定修复方案，到修复的每个过程、建立修复档案，直至交接入库，何谋忠对整个修复流程和质量要求有严格的规定，也正因为这样的严谨，保证了抢救修复工作圆满完成。“这批剧本我们用了三年时间，把481册书将近13000页全部修复完成。目前修复完成的剧本已经全部得到整理出版，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还要通过这批剧本将一些失传的剧种复排，这让我们更有成就感，感觉通过我们的工作让这批文献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何谋忠认为，这个“项目”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可以作为以后工作的范例，多方面配合对古籍进行全面的保护与整理挖掘。

### 手脑并用：传统技艺的创新应用

进入到修复行业，何谋忠在带领团队进行修复时，除了提升动手能力，还在工作中不断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新性地发明了一些适用于修复工作的工

具和技法。

“每一种书籍的破损情况都不一样，适用的修复方法也不一样，特别是有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常常需要实验，采用一些创新性的方法。”何谋忠举例说，马尼拉纸是一种极薄、可以透光的皮纸，一般用于古籍糟朽书页的托补，但因为其伸缩性比较大，一旦刷完糨糊再覆到古籍书页上，掌握不好就会皱到一起，后来何谋忠想到了可以利用“塑料薄膜”，即将马尼拉纸放在塑料薄膜上刷糨糊，利用塑料薄膜把马尼拉纸平整覆到书页上，再将之取下，解决了马尼拉纸发皱的问题。

“还有原来的补书版，在补书的时候会沾上糨糊，粘破书页，想了好多种办法都不行，后来还是在补书板上绷了一层纱布，糨糊沾上也不粘，不管是用来补、揭、托、衬等，都非常方便。”像这种为了工作便利而创新性制作的小工具还有很多，比如古籍装订打“眼子”的时候，锥子拿不端，“眼子”就容易斜，何谋忠便动手，把针锥固定到财务打传票的机子上，用机器的垂直力来避免打偏的问题。再比如，在做函套的时候，需要打边45度角，有时候不注意就容易把手削了，最后何谋忠看到一个工业用的打边机，也可以称作“U型开槽机”，就将之应用到古籍修复中，“一个纸板拿起来，机子一过45度角马上就打出来，甚至有些直接开出来以后一折就可以做函套，非常方便。做完以后一时干不了，我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烘干机。就是很大的一个板子，底下有加热，放到上面一压，用三四十度的温度第二天早上就干了。”何谋忠开玩笑说，自己在动手能力方面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 管理推动：安全、量化、质量三管齐下

身为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科科长，何谋忠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管理责任，而古籍安全、量化管理、修复质量就是他抓的主要问题。

“我们修复的古籍都很珍贵，古籍文物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何谋忠强调，每次交接取书、还书要经过三次清点，分别是书库取书时、交到每个修复师手里之前、还书时，还要和每个人签订安全责任书，规定只要离开工作桌，就要将古籍放到保险柜中保存。为了方便工作，甘肃省图书馆为每位修复师配备了保险柜。“书修的怎么样是一回事儿，修不好的话还可以返工重修，但安全出问题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一直对安全问题抓的比较紧。”何谋忠说。

在何谋忠看来，量化管理是一项需要相互配合和沟通交流的工作。取回一批书，先做一个整体量化，和修复者坐到一起，确定有多少叶要修，破损几级，怎样制定修复方案，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在大家认同且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来定任务，这是何谋忠的量化管理原则。“其实这样定任务，是为了保证修复者可以愉悦且踏实的做工作，而不用着急赶工期，这与质量问题也是挂钩的。”在何谋忠看来，质量问题是除安全问题之外最需要注意的。

“一本书的修复从制定修复方案开始，这是修复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馆修复古籍的制度。每次制定修复，我们所有的修复师都会一起参与，商量怎么修，用什么纸张，等等；如果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与修复方案不符的情况，要再集中进行研讨，不能私自更改；修复完成后，验收环节需要修复者本人、修复管理者、质量验收员三人认可并签字才算通过，而且所有的过程都需要在档案中有记录。”何谋忠表示，希望通过高效精准的管理推动甘肃省图书馆古籍修复的发展。

为了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保存保护中华古籍，国家图书馆于2013年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在全国设立30余家传习所。像何谋忠这样的助理导师们，是古籍修复队伍中的中青年骨干，他们正在带动着更多的修复师们，用双手抢救濒危的古籍，让祖辈遗留的文化遗产重获新生。



# 纸墨上的日月光华

□喻 融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0 年 9 月，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举办的全国首届学员结业展览上，复旦大学传习所展出了一组装帧精美的复旦百年石刻传拓作品。

这组作品不仅包括了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校区的历史石刻拓片，还包括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校园里老校长谢希德题的迁校奠基石拓片，苏步青校长、中文系教授朱东润燕园题字，以及知名历史系教授周谷城题字拓片。



复旦大学传习所首届学员从 2017 年开始创作，历时三年完成的复旦百年石刻传拓作品，从传拓、装裱到装具设计、装帧均为纯手工制作，作为复旦大学传习所所承担的“复旦百年石刻传拓计划”的主要项目成果，在传习所结业展出后，被复旦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收藏。

说起这些传拓作品的制作缘起还要回到 2015 年 5 月，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复旦大学设立传习所，聘赵嘉福和童芷珍两位古籍修复大家为传习所导师，招收喻融、沈喆、叶倩如三位年轻修复师为首批学员。

赵嘉福先生是国内古籍修复名家，也是上海市碑刻传拓与拓片装裱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特聘专家，赵嘉福先生多年来为复旦大学镌刻了复旦老校长马相伯先生书复旦校训、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书《心经》等。经他推荐，三位学员参加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承办的碑帖拓片修复技术培训班，对传拓这一古老的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人经常会讨论传拓技艺，并利用赵嘉福先生为复旦镌刻的石碑来练习，几年下来，对传拓拓包制作、用纸、用

墨都颇有心得。

在学习过程中，几位年轻人萌生了将复旦校园现存石刻作品、制作留存一份原拓拓本的想法，并得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以及时任学校宣传部副部长周鹏、古保院王启元博士的大力支持，图书馆特向校宣传部申请设立“复旦百年石刻传拓计划”，不仅针对邯郸校区石刻制作拓片，还在赵嘉福先生带领下，远赴重庆，走访复旦北碚老校区的历史石刻制作拓片，这些历史石刻包括《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周谷城题《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址》、谢希德题《抗战时期复旦大学迁校碑》、“孙寒冰教授墓志”等重要历史档案资料。

其中最为珍贵的《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保存在重庆三峡历史博物馆，在三峡历史博物馆和重庆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几位年轻人有幸寻得此碑实物并留存拓片。碑由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手书，碑高 252 厘米、宽 117.5 厘米、厚 11.5 厘米，由重庆地区常见的青灰色砂岩凿制而成，碑文楷书，题名《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全文共计 400 余字，真实记录日本侵华历史，详述复旦师生孙寒冰教授

等 7 人遭日机轰炸致死以及校舍、图书、仪器被毁惨剧，并昭示碑纪事的意义——“用诏万世，不忘寇仇”。1941 年 8 月 1 日，碑以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代理校长吴南轩、副校长江一平名义所刻，石碑原立于夏坝后山孙寒冰教授墓前，“文革”时期，孙先生墓地惨遭破坏，此碑一时不知所踪。1984 年，由复旦校友周顺之、陈秉超访得，现孙寒冰教授墓前所立水泥塑石碑为其缩小复制品。

如今，重庆夏坝后山孙寒冰教授陵墓一如既往的宁静，隔壁小市场里忙于生计的行人无暇关注它；当地博物馆冰冷的库房里，碑刻藏品清单亦无记载。但当年年轻的拓拓学员，用均匀细腻的棉连纸与云头艳特有的墨色，再现这些石刻上岁月沧桑所带来的凹凸不平与斑驳陆离时，百年复旦的故事仿佛蕴藏其中。面对这一组复旦百年石刻的拓片作品，能感觉历史将你包围，向你诉说，使你激动，令你沉思。

百年复旦石刻传拓计划已经结项，但石碑的走访、拓片的制作和装帧工作并没有停止，恰逢复旦大学档案馆征集老校长档案资料，该拓片作为重要档案被档案馆收录，成为复旦历史的一部分。

## 清代《琴学入门》版本与内容考

□四川 彭 雄

《琴学入门》最早刻本产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作者张鹤，字静蓼，浙江瑞安人。张鹤是上海玉清观的道士，擅长诗、书、琴、画，曾师从柘浦祝凤喈先生学琴。祝凤喈，字桐君，19 岁便从其胞兄祝凤鸣学琴，致力于琴学 30 余年，著有《与古斋琴谱》。张鹤把祝氏家传秘谱加上工尺谱，又整理了《与古斋琴谱》中关于古琴的论述，编辑成为这部《琴学入门》，甫一出版，便风靡一时。后来，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七年（1881）该书两度重刻再版，可以说，是清末最流行的入门琴书之一。

《琴学入门》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论琴，下卷记谱。一种版本为四卷本。上卷（卷一）摘录《与古斋琴谱》的内容。张鹤的古琴师傅祝凤喈先生多年搜集明、清两朝

30 多种古代琴谱，经过比较，认为苏琴山的《春草堂琴谱》最为优秀，后以此为基础，撰写了《与古斋琴谱》，并创立了浦城琴派。另外，上卷还收有《左右手指图说》，共有左右手指按弦手势 32 种，图文并茂，刻印精美。

下卷（卷二、三、四）为琴谱二集，张鹤按琴曲分为五调以别五音共收 20 首古琴名曲谱，其中《风云际会》《渔樵问答》《平沙落雁》《石上流泉》《阳关三叠》《古琴吟》6 首曲目，为祝凤喈先生家传秘谱。所收琴谱中，有十曲在指法减字谱的旁边注有工尺谱字，其中又有五曲另备所谓音节谱，即在工尺字旁用贴拍的方法记写琴曲的节奏。以往古琴的减字谱只记音位、指法，不记音高、节奏，这种合参谱式对古琴发展以及古曲的传承颇为重要。

《琴学入门》出版后，好评如潮，影响甚大，初学者纷纷以之为入门必读。但是，个别行家里手仍然在书中发现些许谬误。祝凤喈先生也发现书中有不尽人意之处，本来想亲自重新校订，却不料因病忽然离世。而张鹤先生也因眼病无法亲自校对，只好委托玉清观的道士取原稿再校一遍，结果发现《庄周》《风云》等 5 首曲子的原稿已失，故第二种版本的《琴学入门》卷三、卷四只收入 15 首曲谱。

第三个版本，上卷内容没有什么变化，下卷略有不同，其卷首页下刻“同治癸酉重校”牌记、题署“铁沙润李士重校”“柘浦祝桐君先生鉴定”“城野鹤道人张静蓼辑、金闾子仙吴嗣昭参订”；另一个版本署名题写为“上海邑庙玉清宫道人张

鹤静蓼辑，徒陆琮少云校刊”。

下卷曲谱中，有十曲在指法减字谱的旁边注有工尺谱字，其中又有五曲另备音节谱，分“夹钟均（韵）、中吕均（韵）、夷则均（韵）、无射均（韵）”，其中，夹钟均下收《春山听杜鹃》《捣衣》两曲；中吕均下收《平沙落雁》《石上流泉》《渔樵问答》《高山》《圯桥进履》《鸥鹭忘机》《梧叶秋风》《归来去辞》《谈章》九曲；夷则均下收《挟仙》《樵歌》两曲；无射均下收《阳关三叠》《静观》两曲。

古人说：“高山流水觅知音。”古琴音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琴曲谱中收集的《阳关三叠》《渔樵问答》《高山》《流水》等名曲，至今仍流行于世，成为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传承千年。

《幼学须知》又名《幼学琼林》，是明末清初程登吉所撰蒙学名著，该书民间流传甚广，公藏机构罕见。民间在程登吉原著基础上，经过黄汪若、钱元龙、唐良瑜和唐良瑚、邹圣脉、谢梅林、邹可庭、石秉楠、董成、周达用等人增补、校改，产生众多版本，包括《幼学须知句解》《幼学须知直解》《幼学故事琼林》《绘图幼学故事琼林》《幼学求源》等，《幼学须知直解》就是唐良瑜和唐良瑚集注本。

本人获得黄山屯溪同文堂刻《幼学须知直解》，查《中国古籍总目》，收录有《幼学须知句解》《幼学句解》《幼学故事琼林》《幼学求源》等，《幼学须知直解》则未见著录，可见其珍稀程度。而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上，搜索“幼学须知”“幼学琼林”“幼学故事琼林”“幼学求源”，得到 382 条目录，去其重复，有 354 条结果，其中仅有一条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系清广东聚贤堂刻本《幼学须知直解》。

屯溪古时隶属休宁，为古徽州六县之一，该地出现过许多刻书大家，并刻印了大量书籍。据《休宁县志》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本县屯溪就有茹古堂、聚文堂、秀文堂、同文堂等刻字店。这些刻字店由手工木刻，逐步发展为石印、铅印印刷业。”可见，同文堂成立于 1863 年前。到了 1918 年，据“安徽省立二师（即今休宁中学）学生张正春所作的屯溪商业状况的调查，书店有锦文、科学、茹古堂、三元、震元、同文”。《屯溪市志》中则云：“民国初年，屯溪印刷业有‘茹古堂’‘聚文堂’‘秀文堂’‘同文堂’‘翰墨林’5 家。抗日战争期间，增至 9 家，除刊印书籍外，还代客刻制印章，兼售书报、文具。”《休宁县志》也提到“民国 30 年（1941），原来的茹古堂、聚文堂等印刷店开始拥有印刷机械”，其中亦包含同文堂在内。可见，到 1941 年同文堂还存世，但其具体消失的时间无资料记载。

查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以“同文堂”为关键词搜索得到 259 条结果，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道西斋日记》明确标注为清光绪十三年（1887）安徽屯溪同文堂刻本。戴元枝《明清徽州杂字研究》提及屯溪同文堂本书籍，包括光绪辛卯年（1891）重印的《新增见心集尺牍》，及《新镌便蒙群珠杂字》《应急杂字》等。查孔夫子旧书网上，有 9 种屯溪同文堂刻古籍，《幼学须知直解》则系孤本。

屯溪同文堂作为刻字店至少存在了 78 年，其刊刻梓行的书籍很多，但屯溪“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迄今流通的古籍已较罕见，此次徽州屯溪上街八家栈杨同文堂本《幼学须知直解》的发现，对于徽州尤其是屯溪的刻书史研究以及黄山文化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该书破损严重，纸质软塌，不便阅读，笔者对其进行了仔细修复，并妥善保存于复旦大学图书馆，便于以后对其研究利用。

## 黄山屯溪同文堂刻《幼学须知直解》发现与保护

□孔杰巨 复旦大学档案馆